

抗戰時期的澳門演劇活動述評

黃子祺*

抗日戰爭時期，隨着各地深受炮火攻擊與軍事威脅，國內掀起了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全方位的抗日救亡運動。在如此抗戰環境之下，中國仍存在着特殊的“中立”地區。中國澳門在二戰期間仍處於澳葡殖民政府的統治之下，深受葡萄牙當局外交政策影響，必須執行與葡萄牙一致的中立政策。與此同時，“日本在澳門成立特務機關，嚴令禁止在澳門進行任何抗日活動”。¹ 在如此政治勢力的作用下，澳門成為了亞洲地區唯一避開戰爭的特殊地帶。然而，身處澳門的國人並未偏安一隅。隨着民族危機的加劇與抗戰局勢的愈演愈烈，他們開始進行一系列演劇活動，在戲劇中滲透抗戰元素，形成了澳門獨特的文化抗戰形式。由此，抗戰時期澳門的演劇活動在文化抗戰中具有極為特殊且重要的地位、意義與價值。但是，目前澳門以演劇方式進行的文化抗戰研究尚未得到足夠重視，相關的研究成果較少。鑒於此，本文圍繞抗戰時期澳門為何選擇演劇活動以進行抗戰宣傳、澳門職業劇團在文化抗戰中扮演了何種重要角色、澳門業餘劇團如何探索並與職業劇團共同推動文化抗戰這三個主要問題，展開研究論述。

一、演劇：澳門文化抗戰的重要形式

澳門演劇活動之所以能成為文化抗戰的重要形式，既是因為受到澳門中立政策的影響，也離不開澳門本土愛國人士與前往澳門避難的文藝界人士的推動，同時是基於戲劇可作為一種通俗易懂的藝術形式以迎合澳門民眾戰時娛樂生活的文化選擇。

在中立的環境下，澳門的愛國團體無法直接以抗戰和救國的名義來進行抗戰宣傳，只能以賑災籌款的形式來呼籲民眾抗戰，成立了諸多本地救災會。其中，於1937年8月12日成立的澳門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即澳

* 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創意寫作專業博士研究生。

¹ 何燕漪：“抗戰時期‘澳門四界救災會’的愛國活動”，《人文天下》，2015年第18期，第86-88頁。

門四界救災會）是當時澳門影響最大的愛國組織與力量，其成員包括了陳卓瑩、任劍輝和張植華等知名戲劇家。這些戲劇家為澳門建構了一套通過戲劇演出宣傳抗戰的文化抗戰機制。他們利用自身的文化影響力吸引澳門民眾前往觀看抗戰話劇，如《烙印》《布袋隊》等，以慷慨義演的形式鼓舞和調動民眾的愛國激情，促使觀看戲劇的愛國人士為抗日戰爭募捐，從而使戲劇演出成為了澳門文藝界愛國人士有組織地將自身文化資本轉化為抗戰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的過程。由此，戲劇演出作為澳門文藝界與愛國團體呼籲本土民眾參與抗戰的重要方式，象徵着一種具有民眾基礎的地方性愛國活動，成為了澳門文化抗戰的重要一環。

除了救災會以外，以澳門學生為主的劇團也積極參與抗戰宣傳，通過劇本的發表與演繹來歌頌愛國精神與宣傳抗戰意識，使戲劇成為澳門青年學生抗戰意識的表現。培正暴風劇社是以澳門培正中學學生為主體成員的劇團，該劇團創作了抗戰時期澳門唯一以文字發表和出版的劇本《耶誕節前夜》。此劇看似是一個宗教文化宣傳劇本，實則以中國基督教徒為主人公，講述了其與教友以及自己的兒子共同參與抗戰的故事，融合了基督教元素與民族精神，體現出澳門抗戰戲劇獨具一格的文化特質。並且，該劇社的成員也前往各地進行戲劇演出，傳播了澳門抗戰戲劇，此舉不僅提升了來自澳門的暴風劇社的知名度，也使澳門通過戲劇融入了全國文化抗戰。

從香港前往澳門避難的戲劇界人士帶來了豐富的戲劇經驗，他們富有思想性和戰鬥性的劇本選擇使澳門成為了進行抗戰戲劇創新與展示的重要文化陣地。1942年，在香港劇壇頗負盛名的張雪峰聯合澳門本地文藝界人士成立了抗戰劇團“藝聯”，這是澳門第一個職業話劇團。“藝聯”在澳門演出了一系列由中國歷史人物或經典故事改編的內地劇碼，如《雷雨》《武則天》等，其高超的藝術水準，不僅吸引着澳門本地的戲劇愛好者，甚至深受風月場所人士所歡迎，“澳門福隆新街風月場女子十分喜歡，‘紅牌阿姑’甚至經常包起戲院一兩排位請她們的客人來看”。² 之後出現的中藝劇團、中流劇團等職業話劇團也沿襲了藝聯的劇本選擇習慣，以內地知名劇作家所作的劇本為主。由此可見，香港人士為澳門引進了職業劇團，促進了戰時澳門戲劇演出的標準化，提升了澳門戲劇的藝術水準，進而有利於澳門戲劇發揮喚起民眾抗戰意識的文化宣傳作用。

² 鄭應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澳門話劇的發展特點”，《華文文學》，2021年第4期，第43-49頁。

此外，戲劇是戰時澳門民眾娛樂生活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份，以戲劇的形式植入抗戰意識是澳門有識之士基於澳門本土民眾的實際情況而做出的文化選擇。一方面，電影業在澳門的沉寂為澳門戲劇的發展提供了契機。戰爭的爆發中斷了海外影片的供應，民眾不再以觀影為主要的消遣方式，轉而觀看澳門戲劇。觀看戲劇的民眾增多，則在客觀上意味着戲劇中的思想意識也在民眾中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澳門的愛國組織與職業劇團便抓住此機，以滿足民眾娛樂需求的方式演出抗戰戲劇，以演劇的形式履行抗戰宣傳的職責。另一方面，相比於報刊和圖書等讀物，戲劇直觀的表達方式更有利於為普通乃至底層民眾所理解。由於澳門過去處於漫長的“漁村時代”，基礎較差，而澳葡政府長期不重視華文教育，與內地的一些文化城市相比，澳門華人文化水準仍是偏低。³ 戲劇這一演出形式以視聽語言的方式呈現故事，對民眾識字程度並無要求，與當時澳門民眾的受教育程度相匹配，更能為他們所接受。由此，在諸多因素的作用下，戲劇最終成為了澳門用以抗戰宣傳的重要形式。

二、職業劇團：澳門文化抗戰中的中流砥柱

澳門戲劇發展最繁榮且空前絕後的時期，是抗戰時期。這一時期的戲劇繁榮源於該時期澳門的職業劇團，它們書寫了澳門戲劇史上極為重要的篇章，以戲劇的方式呈現出澳門的國家認同感。1941年，日本佔領了香港，大批居住在香港的戲劇家開始於1942年前後前往澳門避難。其中從香港而來的張雪峰是“中國旅行劇團廣東話組”的創辦者之一，具有相當的戲劇導演經驗。1942年4月，他與陳有後、梁寒淡等港澳劇人在澳門成立澳門首個職業劇團“藝聯”。雖然此劇團在澳門的駐留時間不足半年，但“藝聯”成員在該時期共同鑽研演繹技法，排演了《生死戀》《茶花女》《精忠報國》《武則天》《雷雨》《明末遺恨》《巡閱使》《春風秋雨》《塞上風雲》等一批兼具超高藝術水準、思想性與戰鬥性的大型劇碼。職業劇團也隨之成為了澳門抗戰宣傳中的中流砥柱。

“藝聯”帶來的一系列富有戰鬥精神的劇碼，雖然並不屬於澳門的本土戲劇，但卻恰好皆為內地劇碼。並且，“藝聯”的這些主要成員，雖然之前的足跡早已到達過港澳，然而卻是直接受到中國戲劇的滋養，以大陸戲劇的方式來展示

³ 楊學淵：《20世紀澳門華文文學社團與文學發展》，暨南大學，2001年。

“澳門戲劇”。⁴ 戲劇文化的同源背後是澳門與內地文化的同源，這種同源的性質也極大地增強了澳門民眾的民族認同與愛國精神，使澳門民眾通過戲劇融入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時，“藝聯”承襲了救災會以戲劇演出來籌款的傳統，並配以專業化的演出水準，使得職業劇團演出的戲劇在澳門引起巨大反響。正是“藝聯”的號召力、凝聚力以及一系列卓有成就的抗戰演劇活動，不僅使澳門民眾認可了戲劇作為一種在特殊政治環境下的抗戰形式，同時“藝聯”深入人心的文化抗戰也直接影響着後來澳門職業劇團的出現與成長，使之能接過“藝聯”的文化抗戰使命，持續為澳門抗戰貢獻力量。在“藝聯”轉向內地演出後，部份“藝聯”成員仍留在澳門，於1943年成立了中藝劇團。該劇團存在時間較短，不到一年便解散。但該劇團的成員仍堅守在澳門文化抗戰的崗位上，於1944年聯合澳門本地的其他戲劇工作者再次組建劇團——中流劇團。這兩個劇團排演過沈浮《金玉滿堂》、郭沫若《孔雀膽》等戲劇。

澳門職業劇團的出現，實際上是在澳門履行着第三廳的職能，通過演劇宣傳團結澳門民眾，是澳門文化抗戰中的主力。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是1938年4月1日在武漢設立的隸屬國家政治部的部門機構，主要職能是通過文藝宣傳以支援抗戰，廳長為郭沫若，主任秘書為陽翰笙。他們創作了大量符合抗戰精神的歷史劇，尤其是郭沫若根據當時的抗戰文藝方針，創作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漸離》《孔雀膽》《南冠草》六部最具代表性的歷史劇。並且，第三廳領導着一支深入民眾進行抗戰演劇的隊伍——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敵演劇宣傳隊，在全國各地排演歷史劇。該隊伍作為抗日戰爭時期極具代表性的話劇團體，被稱為文藝的“輕騎兵”，他們將話劇作為抗戰宣傳的武器，以農民、士兵為主要觀眾，探索出了一條將話劇推向普通民眾的發展道路。⁵ 相比內地抗敵演劇活動的統一領導，雖然澳門特殊的政治環境促使其無法貫徹統一的文化抗戰方針，無法像內地抗敵演劇隊在第三廳的領導下展開抗戰行動，但澳門職業劇團的出現改變了澳門這一被動的抗戰局面。澳門職業劇團肩負起第三廳的職能，以專業化和標準化的演戲宣傳支援抗戰，並以自身影響力推動着後來澳門職業劇團持續的演劇抗戰工作。

⁴ 鄭應峰：“澳門現代戲劇的文化本土意識建構過程分析”，《藝術評論》，2014年第5期，第76-83頁。

⁵ 張文心：“從檔案信函看郭沫若與抗敵演劇隊的關係”，《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20年15(02)期，第162-169頁。

除了職能的自覺履行以外，澳門職業劇團在實際工作執行中，也沿用了第三廳成員產出的戲劇作品，保持着演劇內容的同步與一致。從劇碼的作者來源看，澳門的職業劇團曾多次選擇第三廳成員的戲劇進行演出，如陽翰笙的《塞上風雲》、郭沫若的《武則天》《孔雀膽》等歷史劇。相比之前救災會的戲劇演出，“藝聯”等職業劇團雖未將抗戰作為戲劇內容直接呈現，但其直接移植內地抗戰劇碼的行為，實際上是從文化選擇的層面表明其與內地演劇抗戰活動的相同政治立場，是澳門職業劇團對國家文化抗戰的回應。並且，早於澳門職業劇團出現的救災會也多以粵劇為表演劇碼。作為在澳門產生廣泛影響的四界救災會，其下設的演劇組織也是一支以粵劇名伶為代表的粵劇股。⁶ 而澳門職業劇團所選擇的歷史劇則超越了本土戲劇的局限，將華文歷史劇引入澳門，進一步促進了統一戰線在澳門的構建。由此，澳門職業劇團成為了澳門文化抗戰的有力推動者。

三、業餘劇團：澳門文化抗戰的大眾化路線

澳門的業餘劇團探索出了一條與職業化劇團迥然不同的文化抗戰道路。業餘劇團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既扮演着澳門文化抗戰先行者的角色，又借鑒了職業劇團演劇經驗，在職業劇團走向沉寂之時繼續探索和發展以演劇支援抗戰的文化抗戰模式。

自 1937 年起，澳門前鋒劇社、曉鐘劇社等群眾性文藝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它們通過演出戲劇的方式呼籲澳門民眾募捐救災，以救災的名義如火如荼地展開抗戰宣傳工作，共赴國難，成為澳門率先進行文化抗戰的群眾性愛國組織。前鋒劇社演出過描寫東北義士為國犧牲的英勇故事的《烙印》；曉鐘劇社演出過描寫封建壓迫悲劇的《蘭芝與仲卿》、描寫中華民族抗擊惡魔侵略的《布袋隊》；綠光劇社演出過描寫東北淪落敵手後人民的慘痛故事的《盲啞恨》。⁷ 這些戲劇表面上看似強調百姓受壓迫與反抗，但其背後指向的正是抗日戰爭中中國所處的境地，歌頌了中國人民堅決抵禦外敵入侵的愛國精神。這些業餘劇團曲折而隱晦地向澳門民眾傳達了抗戰精神，是文化抗戰在澳門的內容嘗試。

⁶ 何燕漪：“抗戰時期‘澳門四界救災會’的愛國活動”，《人文天下》，2015 年第 18 期，第 86-88 頁。

⁷ 張劍樺：“澳門戲劇文學發展軌跡述略”，《藝術百家》，2009 年 25(03)期，第 149-154 頁。

作為先行者的業餘劇團，業餘劇團的組建也是一種源自民眾的文化抗戰嘗試。雖然由中國共產黨員在澳門創立的文化界抗日救國會理事會協助了當地業餘劇團的創辦，但這些業餘劇團的成員背景多元，大多並不是專業的戲劇家，而是包括了教師、學生等在內的來自社會各階層的人士。不同於職業劇團由著名戲劇家牽頭，以戲劇演出來感召民眾一致抗日，業餘劇團是由澳門民眾自發參與和組建的愛國社團，它們的成立意味着一部份澳門民眾已經擁有了參與文化抗戰的自覺，肩負起抗戰救國的責任。他們熟知澳門當地情況，巡演的足跡遍佈澳門，使抗戰文化在澳門得到廣泛傳播。由此，在業餘劇團廣泛而深入民眾的宣傳下，一條“從民眾中來，到民眾中去”的大眾化的文化抗戰路線得以形成。

若僅是依靠戲劇主題表達與人員來源廣泛這兩個特質，澳門的業餘劇團並不足以成為澳門文化抗戰的重要支撐。除此以外，“業餘戲劇和職業化戲劇互相借鑒互相影響”，⁸ 業餘劇團除了澳門民眾的主動參與外，也與留澳的職業劇團成員通力合作，以發展戲劇的形式繼續承擔着救亡的重任，擴大澳門文化抗戰層面的統一戰線。受澳門職業劇團專業化的演劇標準影響，業餘劇團也開始技術與理論層面進行探索，鑽研戲劇動作細節對觀眾的直接影響，並強調戲劇的社會功能，加強劇團與其他社會組織的聯繫，共同承擔社會責任。戲劇技術的鑽研能鮮活生動地將抗戰精神傳達給觀眾，而強調戲劇的社會功能又進一步發揮了業餘劇團團結大眾的作用，完成對職業劇團在文化抗戰上的補充。

直至抗戰勝利，業餘劇團的發展依舊欣欣向榮，其使命由抗戰宣傳轉為公益宣傳，延續着主動擔當社會責任的傳統，與社會各界保持着密切聯繫。比如，澳門業餘劇團積極支援兩廣地區的發展，分別在 1947 年兩廣水災和 1949 年廣東水災後演出戲劇《生財有道》和《洪流》，為內地救災工作籌款募捐，增強了澳門業餘劇團與內地民眾的聯繫。這種良性的文化互動是業餘劇團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精神在新時代的創新闡釋與實踐，不僅進一步擴展了劇團的民眾基礎，也在支援內地的過程中鞏固了澳門與內地是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共識。

⁸ 鄭應峰：“澳門早期現代戲劇的發展動因”，《短篇小說（原創版）》，2015 年第 18 期，第 15-16 頁。

四、結語

與內地聲勢浩大的抗戰方式相比，作為“中立”地帶的澳門的文化抗戰形式更加隱晦與溫和。面對民族危機的到來，澳門劇人不得不打着“救災”的名號，以演劇活動的形式進行抗戰宣傳，向民眾講述抗戰救國的道理。隨着演劇活動的興起，職業劇團與業餘劇團在文化抗戰中逐漸分工明確。前者強調以專業的藝術素養取得觀眾的高度認可，發揮其影響力與號召力感召民眾同仇敵愾，一同救國；後者則大範圍地鼓動民眾參與演劇，從民眾內部出發，走向與社會各界的聯合，實踐出一條大眾化的抗戰宣傳路線。兩者殊途同歸，一致指向了澳門民眾，起到了團結大眾共同抗日的重要作用。

隨着民族危機的解除，職業劇團的戰時使命已經完成，面臨着解散，而業餘劇團則承繼了職業劇團的演出經驗，繼續執行其團結社會群眾的職能，挖掘着戲劇在新時代的社會功能。儘管職業劇團消失於澳門，但職業劇團的出現仍對澳門戲劇史產生了震動，職業劇團中的戲劇名家在澳門排演的戲劇直接推動了澳門本土藝術水準的提高。同時，職業劇團也緊貼內地第三廳的文化方針，緊隨內地文化抗戰的步調，在“中立”政治環境下的澳門扮演着文化抗戰中的中流砥柱角色。而業餘劇團不僅在抗戰中深入澳門民眾，同時也在抗戰勝利後成功轉型，成為文化宣傳的重要力量。兩類劇團及其演劇活動共同組成了澳門抗戰戲劇史，詮釋了特殊時期下中國“中立”地帶獨有的文化抗戰模式。